

怒放的生命之花

◆ 耶林:从“社员”到“盟员”

耶林,原名张眺,1901年出生于山东省潍县一知识分子家庭,幼年发蒙诵读古诗词、习字画。耶林从潍县旧制中学毕业,17岁时在公立小学执教。五四运动爆发,耶林带领学生参与游行、罢课,四处演讲,并接触到鲁迅的作品。其时耶林开始从事西洋画创作,主要画人体素描和油画。24岁时他辞去教职,和同学一起到青岛做自由画者。

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运动,青岛在共产党人邓恩领导下,也掀起轰轰烈烈的罢工斗争,耶林积极参与其中。其时他在写诗和创作小说,并加入了中共组织,也已回到家乡寒亭,在潍县县中教美术。他借助这个平台,分析国内政治形势,启发学生,引起国民党县党部怀疑。于是,他只得离开家乡,一路辗转,于1929年春到了杭州。

耶林在杭州考入林风眠创办的西湖艺术学院研究部(后改为杭州国立艺专),师从法籍教授克罗斯多和林风眠学油画,同学中有后来成为中国画坛巨擘的李可染。同学汪占辉(汪占非)记得,“张眺在杭州读书时,生活甚为朴素,是一个穷学生。他和李可染同住在一间小房子里”。耶林和一些倾向进步的同学成

立了一个文艺社团,因那年是民国十八年,故取社名“一八艺社”,他们即为该社社员。

1930年初,耶林因在艺术院传阅进步书刊等活动遭当局逮捕。他的同学、老师积极营救他,包括法国教授克罗斯多。最后当局因为找不到证据,只得让林风眠以校长的名义担保,释放耶林。

耶林获释后,眼看杭州不能久留,便前往上海,开始了他成为左联盟员的经历。据阳翰笙回忆:“我在‘左联’担任党团书记时认识他(耶林)的,我们在一起工作过。后来,我被调到‘文总’和中共上海局文委工作,中央曾委派他(耶林)担任过‘左联’党团书记。”在阳翰笙的印象中,“耶林对党忠诚,工作刻苦努力,他对人宽厚,很能团结人。”

作为左联盟员,耶林在左联时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村中》刊登于《北斗》1931年第1卷第4期。钱杏邨(阿英)在《1931年中国文坛的回顾》中写道:“在描写战争以及士兵生活的‘大著’以外,有一个‘短篇’倒是不能忽略的,那是耶林的《村中》。”《北斗》主编丁玲评价道:“关于《村中》的题材……都非常有可取之地方,比较一般自身周围打圈子寻取恋爱的悲喜剧材料的,已经显得不枯燥

的多了,而且新鲜。”

20世纪30年代,耶林曾给素未谋面的丁玲写过四封信。他在第一封信中说,丁玲的作品和她主编的《北斗》杂志,“我差不多是全看了的”“我仿佛觉得你写的文章在某一方面说,是不如从前了,虽然你是在很努力地向着新的方面进行着,同时有很多人拼命的(地)赞美你!……”第二封信中写道:“在《北斗》前面那一张画是很好啊!”这幅画即是指为纪念左联五烈士,刊登在《北斗》创刊号上的珂勒惠支的黑白木刻《牺牲》。对这幅木刻的肯定,折射出耶林对牺牲的左联盟员的怀念之情。

耶林在第三封信中推荐了有才华的青年黎市(李岫石),那幅著名的鲁迅与青年木刻者合影中,就有黎市的身影。耶林在第四封信中一针见血地批评了刊登在《北斗》第1~2期上的两篇短篇小说《一幅剪影》和《一侍女》……这两篇小说的作者是姚蓬子。从耶林与丁玲的通信中,还可窥见尽管忙于左联各项文化工作和社会活动,耶林也没有放下文学创作,他继续写出《开辟》《月台上》等小说及一些评论和散文。

1933年初,耶林被中共中央派往赣东北苏区开展工作,不幸在那年冬季去世,时年33岁。

“努力、努力,无时无刻,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

汪寿华,原名何纪元,字介尘,化名何今亮、何松林等,1901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檀头乡泉吸村的一个旧知识分子家庭。1917年考入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受俄国十月革命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开始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关心国家的命运,同情贫苦人民,经常阅读《新青年》等进步刊物,立志下“苦学”的功夫,为了改造中国的“真正弱点”,“努力、努力,无时无刻,制造文明的武器,来做国家的根基”。

1920年6月,汪寿华在上海参加沪滨工读互助团,9月到外国语学社学习。不久,经俞秀松介绍加入中国青年团。1923年,汪寿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作为远东职工代表在莫斯科出席国际反帝同盟会议。1924年当选海会工委书记,同年年底奉调回国。中共中央决定新的上海区委由王一飞、汪寿华、庄文恭等委员组成,汪寿华负责工人运动工作。

“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干!”

1925年1月,汪寿华参加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并向大会作了关于职工运动的报告。会后留在上海工作,先后担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常委、区委农工部主任委员、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等职。五卅运动爆发时,汪寿华担任上海总工会宣传部主任,积极协助李立三、刘少奇领导工人运动。不久,担任中共江浙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兼上海总工会代理委员长。

从1925年5月开始,作为上海区委军事特别委员会成员的汪寿华,多次发动上海各行业工人进行大规模罢工斗争,并参与领导了上海工人的第一、二次武装起义。由于准备不足和缺乏斗争经验,两次起义均以失败而告终。

汪寿华 敢于赴死的工人运动先驱

1927年2月23日,中共上海区委联席会议决定,在总结前两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教训的同时,准备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由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等八人组成特别委员会。3月4日,汪寿华主持召开上海工会干部会议,秘密开展武装训练。

同年3月20日,北伐军进驻上海龙华,汪寿华派人到龙华请北伐军东路总指挥白崇禧部队配合工人起义,希望能内外夹击,消灭军阀。但白崇禧已接到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汪寿华知道后十分气愤地对同志们说:“他们不来,我们自己干!”

(摘自《解放日报》文/陆其国)

◆ 左联“秘密盟员”宣侠父

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成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涌现出一大批如雷贯耳的名字:鲁迅、瞿秋白、茅盾、冯雪峰、丁玲、周扬、沈端先(夏衍)、阳翰笙、田汉……以及左联五烈士:冯铿、李伟森、胡也频、柔石、殷夫。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左联盟员也曾以各自的方式战斗着,比如本文即将讲述的宣侠父、蒋光慈、耶林……不幸的是,他们或被害,或因病过早失去了年轻、宝贵的生命。但他们的生命之花都曾怒放过,因此,那绚烂总令人难忘。

宣侠父,又名尧火,号剑魂,生于1899年,浙江诸暨人。其父是小学教员。宣侠父从小随父读书,接受传统文化教育,这为他后来钟情文学、从事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16年,宣侠父考入浙江省立水产科职业学校,并以优异成绩毕业,于1920年获准自费留学日本。在日本学习期间,宣侠父接触到马列著作,开始满腔热情地投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活动中。不久,他的活动引起学校当局的警觉,留学之途由此中止。

1922年,宣侠父回国后来到杭州。在那里,他接触到共产党,不久成为中共党员。后受浙江党组织派遣投考黄埔军校,成为第一期学员。只因他公开顶撞校长蒋介石,遭到开除。宣侠父离开黄埔军校后,回到浙江党组织的怀抱。

1925年夏,宣侠父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李大钊负责的中共北方区委工作。不久受命以左派国民党的公开身份,到驻扎在张家口的冯玉祥部国民军中从事政治工作。后因“清党”,宣侠父与100多名政治干部先被“审查”,继遭“驱逐”。而后宣侠父按组织决定,回到家乡开展秘密斗争。

接下来的几年中,宣侠父充分展露了他的文学才能,他挤出时间创作了两部长篇作品:纪实文学《灰梦》、小说《入伍前后》。正是因为这两部文学作品,宣侠父与左联发生了联系。

长篇纪实文学《灰梦》1930年完成,宣侠父在作品中讲述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自己在冯玉祥西北军中参加政治活动的经历和故事,从中探讨成功和失败的教训,忠实地记录了在北方参加革命斗争的史实。当时在复旦大学任教的陈望道偶然读到《灰梦》书稿后,非常赞赏,并把它推荐给上海北新书局。北新书局的编辑被这部文笔生动、秀丽明快、犀利诙谐的作品所打动。之后,编辑建议将书名改为《西北远征记》,既晓畅明白,也更符合作品的纪实风格。

宣侠父接受了这一建议。考虑到宣侠父的身份,也为了有利于开展秘密工作,该书出版时用了笔名:今秋。

此时宣侠父很想加入左联,他读过一些左联作家的作品,尤其是作为左联“盟主”鲁迅的作品。他向往摆脱在文学之旅上孤军奋战的境况,希望融入这个进步的革命作家团体,与志同道合者并肩奋斗;并在左联这个革命文学团体中,找到更多的同路人。

1931年初,宣侠父来到上海。他想找阳翰笙,因为阳翰笙不仅是左联作家队伍中的一员,还曾担任过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尽管那时宣侠父已经离开黄埔军校,可有这层渊源,一定有共同语言。此时宣侠父不知道,阳翰笙还是左联党团书记。结果他俩惺惺惜惜,一见如故。

阳翰笙告诉宣侠父,他是从其他同志手中借到《西北远征记》,然后一口气读完了。阳翰笙赞赏道,读了这部作品非常感动,作品写得很好。接着他又问起宣侠父目前在写什么新作品。

宣侠父谦逊地回答说,眼下正在写一部自传体小说,计划写20万字,已完成过半,题目叫《入伍前后》。内容是写一个贫农青年参加了国民党军队,接受了革命思想,最后带领部队一起投奔红军的故事。

阳翰笙听了很高兴,说希望能尽快读到这部作品。《入伍前后》杀青后,宣侠父当时自费印了少量,分送左联盟员和一些革命同志。因为没有正式出版,所以随着岁月流逝,这本书今天或已不存。

且说当时阳翰笙知道宣侠父想加入左联,便对他说道:“凭你这两本书和你的文学才华,加入左联不成问题。但以你现在的身份,公开加入左联恐怕不妥,这事且让我们再考虑一下。”

左联几位主要负责人知道这一情况后,也觉得宣侠父加入左联以不公开为好。最后经左联党团组织决定,由阳翰笙向宣侠父宣布,吸收他为左联“秘密盟员”。

1938年7月,宣侠父在西安不幸惨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如果天假以年,他应该有更多好作品问世。

蒋光慈,本名蒋如恒,生于1901年,祖籍河南,因祖父避匪患逃到安徽霍邱,后代遂定居于此。蒋光慈是现代著名作家,被推为“革命文学第一声”,也是“革命+恋爱”写作方式的创造者。

蒋光慈14岁时,父亲送他进入离家五十多里外的河南固始县县立志成小学读书。蒋光慈在那里受到青年进步教师詹谷堂的引导,16岁时加入詹组织的读书会,读到一些进步书刊,这为他后来走上革命道路打下了思想基础。

1916年暑假,蒋光慈考取河南固始中学。但就在第一学期即将结束时,他因不满校长对待贫富学生有失公平,伙同其他学生打校长被开除。好在第二年夏天,蒋光慈由被拜兄长、芜湖省立第五中学学生自治会会长李宗邦推荐,进入芜湖第五中学就读。该校前身是清末皖江中学,历任教员中有章士钊、陈独秀、柏烈武、苏曼殊等名流,又聘请有强烈爱国思想的留日学生、在教育界深孚众望的刘希平和《新青年》编辑高罕担任教师。后者也都提倡白话文,反对封建文化。蒋光慈深受他们的影响,并开始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而后蒋光慈进入上海外国语学校学俄语,1921年5月赴苏联,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并于1922年入党。在苏联学习期间,蒋光慈

◆ 赍志以歿的蒋光慈

的写作兴趣已主要转向文学。

1924年春末夏初,蒋光慈回到国内。不久,经瞿秋白介绍,他到上海大学任教。1925年4月中旬,蒋光慈被组织上派往中共北方局工作,随后由李大钊安排他到冯玉祥部担任苏联顾问的翻译。10月间,蒋光慈回到上海,白天继续在上海大学执教,晚上则在家写作和翻译。

两年后,蒋光慈的长篇小说《丽莎的哀怨》问世。小说描述一个白俄女子在十月革命后流浪到上海,为生活所迫,含羞忍辱出卖自己肉体的哀怨故事。蒋光慈自述这部作品“也只是个尝试而已,自家当然不能引为满意之作”“是成功还是失败”由读者批评。结果有的读者认为这部小说“采取反面的表现方法”,歌颂了十月革命的胜利;有的读者认为作者表现了没落阶级的哀怨和绝望的情绪,流露出没落阶级的感伤情绪。

读者对这部作品的无情责难,让蒋光慈始料未及,尤其是革命文艺界对这部作品的批判和指责,让他感到郁闷不已。加之当时蒋光慈不幸感染了肺结核,精神和肉体备受打击。于是他便去日本待了三个月,一来疗养,二来散心,同时写些作品。

从日本返回上海后,组织上委派蒋

光慈和钱杏邨到“南国社”与田汉联系,以促进“南国社”尽快走向“左倾”,为新兴的普罗戏剧奠定基础。在与田汉的交往中,田汉见蒋光慈单身多年,便把考取新华艺术大学西洋画系、进修美术的“南国社”才女吴似鸿介绍给他。

那是1930年元旦后的一个上午,蒋、吴初次在田汉家里相遇。吴似鸿后来回忆道,蒋光慈“瘦小而白嫩的脸形,瘦长的身躯,讲话时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他那瘦长白嫩的手指在翻着一本《南国月刊》”。那期刊物发表了吴似鸿写的一篇小小说。自那以后,蒋光慈便展开了对吴似鸿的热烈追求,后两人的爱情修成正果。

不久,左联召开成立大会,选举鲁迅、夏衍、冯乃超、钱杏邨、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七人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蒋光慈还负责主编左联机关刊物《拓荒者》月刊。

1930年11月,蒋光慈完成了他最后一部以大革命前开展的农民运动为背景的长篇小说《咆哮了的土地》,但是这部作品遭到当局查禁。

1931年6月,蒋光慈病情突然加重,被急送医院,两个月后终告不治,去世时年仅30岁。

讲 述

黄炎培和中华职业教育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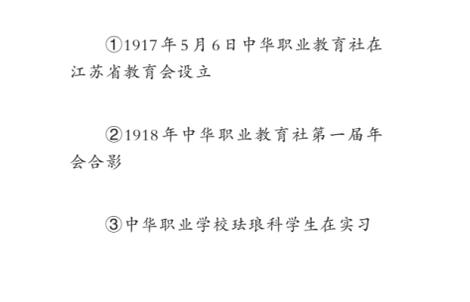
提及黄炎培先生,人们首先想到的应该是他与毛主席的延安“窑洞对”;谈到中国职业教育的发轫与发展,绕不开黄炎培先生和他倡导成立的中华职业教育社;剖析中华职业教育社能够从诞生、成长、到壮大,核心在于它所倡导的家国责任、民族意识、复兴追求与中国共产党的“以人民为中心、人民至上、一切为民”等的初心使命存在天然契合。回首我国波澜壮阔的职业教育发展史和中华职业教育社社史,为民情怀犹如一粒种子孕育、生长、绽放于黄炎培先生的探索、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百余年时间坐标系中。在职业教育进入提质培优、增值赋能快车道当下,有必要通过回溯黄炎培先生和我国职业教育的历史,真正把黄炎培先生的为民情怀发扬光大。

探索路在何方

黄炎培先生倡导职业教育的滥觞,起源于他的一小段经历:十五岁时,黄炎培路过县衙门,见官吏正在惩罚不出地租的农民。欠租的农民,犹如牲畜般被关进笼子施行酷刑,直到活活吊死。这情景使他大受刺激,悲痛于寻常百姓生如蝼蚁、命如草芥般悲惨的一生,他一肚子的不平,却不知出路在哪里。

茫茫探索,不知路在何方。1901年,黄炎培进入南洋公学学习,受蔡元培先生的影响和指点,回川沙故乡后开始“兴教育,办学堂”,开启了他终生不渝的教育事业。

当时的旧中国,受“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等传统思想观念的影响,读书做官成为教育界普遍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普遍鄙视体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者。黄炎培深知此等教育对国家对社会对个人的戕害,“住往所学不能致用,从实际应用上来说,可以说是所学一无所得”“如果这一状况不变,学校普而百业废,社会生计绝矣”。为了继续寻找出路,黄炎培在上海



① 1917年5月6日中华职业教育社在江苏省教育会设立

② 1918年中华职业教育社第一届年合合影

③ 中华职业学校琅琅学生在实习

定居后,研读了大量的西方教育著作,同时考察了美国25个城市的52所学校,后来又考察了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等亚洲国家的职业教育,并撰写了大量介绍国外教育先进经验的文章。

找到明确答案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经过苦苦探索,许以来郁积在黄炎培心中的中国民众出路问题,终于有了明确答案。这个答案就是,实行职业教育——“用教育的方法,使人人依其个性,获得生活的供

给和乐趣,同时,尽其对群之义务,名曰职业教育。”

至此,黄炎培强烈的为民情怀之“矢”,终于找到了职业教育之“的”。

凌空蹈虚,难成千秋之业;求真务实,方能善作善成。为推动职业教育的发展,1917年5月6日,黄炎培联合蔡元培、梁启超等48位教育界、实业界知名人士发起创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在立社宣言书中明确指出:“本社之立,同人鉴于当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中华职业教育社章程》也明确规

定,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总而言之,中华职业教育社的目标,就是通过倡导职业教育来实现一个民主幸福的社会。

全力奔赴国难

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华职业教育社创办职业学校、倡导特殊教育、兴办杂志,开展教育与职业的沟通与试验、研究与宣传。

抗日战争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全

力赴国难,创办《救国通讯录》,发起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与迁川工厂联合会等共同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华职业教育社把抗战作为职业补习教育的重要内容,成为动员群众投入救亡运动的一个重要途径。上海的中共地下党还以“第四中华职业补习学校”名义,组织很多知名教授和学者担任讲师教授进步思想,并选送进步青年参与听课,相当于共产党的干部训练班,有“上海抗大”之称,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成为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工作对象打下坚实的群众基础。

民主革命时期,中华职业教育社通过《国讯》《瞭望》,进修教育出版社等各类渠道宣传反对内战,争取和平民主的思想,还利用自身优势,掩护中共地下党员从事革命工作。

纵观下来,即使外部条件复杂多变,但中华职业教育社秉持所倡导的职业教育是一种谋生的教育、平民的教育、大众的教育理念始终不变,与代表劳苦大众根本利益、价值追求站在一起的初心始终不变。正因为中华职业教育社所倡导的为民情怀,与中国共产党所坚持的人民立场、人民至上的理念不谋而合,所以中华职业教育社对中国共产党事业的无条件支持和拥护,并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渐成长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的职业教育团体。

1949年12月,中华职业教育社总社由上海迁往北京,原址改为上海分社,黄炎培担任理事长,孙起孟兼任总干事。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华职业教育社广泛联系社会各界和海内外关心支持职业教育的人士,为发展职业教育、科教兴国和人才强国战略、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作出了积极贡献。这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坚持人民立场,不断成长壮大绽放的重要标志。

(综合《学习时报》、上海档案信息网)

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 宁愿牺牲一切!

上海工人运动蓬勃发展的良好形势和工会力量的不断壮大,引起了帝国主义的恐慌。他们调集军队,炫耀武力,叫嚣“决不放弃上海”。蒋介石加緊策划一场血腥的反革命大屠杀。1927年4月11日,杜月笙以“有机密大事商谈”为由,“邀请”汪寿华赴宴。汪寿华立即向组织作了汇报。为了党和工人阶级的事业,汪寿华愿牺牲一切,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按时赴约。

为安全起见,组织上决定由李冶之陪同前往。但就在两人即将到达社宅时,汪寿华让李冶之在华格桌路(今宁海西路)杜月笙住处不远的地方等他,如果两个小时他还不出,即有意外,要李立即报告党组织。汪寿华一走进杜月笙住宅,就被等候在那里的杜月笙手下捂住口鼻,装进麻袋,押上汽车,运到枫林桥活埋。噩耗传来,许多与汪寿华并肩战斗的工人们失声痛哭。

次日凌晨,蒋介石便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倒在血泊之中。汪寿华成为这次政变中第一位牺牲的共产党员。汪寿华生前讲:“革命是追求真理的事业,我们应尽力地走我们现在应走的路。如果牺牲了,以后的路自会有人继续走下去的。”

(摘自《学习时报》文/陈安杰)